DOI:10.13967/j.cnki.nhxb.2020.0022

“商量式”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概括

牛 俊 伟
(闽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始终强调“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逐步形成了“商量式”民主的重要思想。“商量式”民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坚持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既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内涵,又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既丰富和创新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又反思和超越了西方“争吵式”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关键词] 习近平; “商量式”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争吵式”民主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20)02-0037-06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和制度建设,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并反复阐述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基本主张,并在党的十九大正式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中,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商量式”民主思想。新时代,深入学习和系统研究习近平“商量式”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从而充分调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乃至海外中华儿女和国际友人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习近平“商量式”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

习近平的“商量式”民主思想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实践的不断推进而逐步形成的。

(一)“商量式”民主思想的初步提出

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确立下来,正式开启了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实践。

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习近平十分重视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2014 年 9 月 21 日,习近平出席人民政协成立 65 周年庆祝大会,在总结人民政协的宝贵经验并深刻论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首次提出“商量式”民主的主张。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历来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在民主协商方面的积极作用。2016 年 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迎新春座谈时说:“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2]再次对“商量式”民主做了说明,并提出了务实协商的基本要求。

(二)“商量式”民主思想的正式确立

经过 3 年的具体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民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一方面,全面总结了 2012 年来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高到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协商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收稿日期] 2019-10-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台湾学生运动研究”资助(编号:17YJCGAT004)
[作者简介] 牛俊伟(1978-),男,内蒙古卓资县人,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政治领域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新的理论成果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新成果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基本方略之一,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并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商量式”民主实践,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做了全面部署。这就意味着“商量式”民主正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被纳入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中,标志着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商量式”民主思想的正式形成。

(三)“商量式”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十九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全面铺开,习近平“商量式”民主思想不断拓展,日趋成熟。

2018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认为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希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用好政党协商这个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和中国共产党“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4]。

坚持以对话解决国际争端、以协商化解国家间的分歧,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2019 年4 月23 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 周年纪念日,当日习近平在会见出席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谈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国家间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能动辄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应坚持平等协商,完善危机沟通机制,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推动涉海分歧妥善解决”[5]。首次把“商量式”民主思想扩展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军事外交领域。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2019 年 9 月 20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6]对“商量式”民主思想做了新的发挥。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九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大会作了报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并把“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作为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略[7],“商量式”民主思想更趋成熟和定型。

二 “商量式”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有关“商量式”民主的论述,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主要围绕“为何要商量、怎样商量和谁来商量”等重点问题展开阐释,提出了一系列语言鲜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协商民主新论断。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有事好商量”

所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8]。习近平认为,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有事好商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就是跟人民群众“商量着办事”。因为,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1]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绝对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的,而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实现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广泛商量。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和权力机关在遇到关涉老百姓利益的事情时,决不能闭门造车、盲目决策,绝不允许不做调研就轻率施政,要本着为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解忧的公仆理念,闯开大门,广开言路,多听听群众的声音,多问问百姓的意见,多俯下身子和人民商量,只有商量好了,商量透了,做出的决策才可能符合实际,群众也才能满意。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有事多商量”

习近平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要不断

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这就离不开“有事多商量”[3]。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虽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然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正在凸显,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不仅包括对更多的物质生活的多样的高质量的追求,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丰富向往。随着社会利益取向的多样化,“众口难调”,意见不同就成了新常态。要认识这个新常态,更好地适应这个新常态,就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1]。多商量,就是要增加协商的密度,遇到事情进行多次而广泛的沟通商量;多商量就是要增强协商的力度,以理性有度的精神、协同合作的态度、依法依规的方式倾听各种声音,磨合各种意见,优选各种方案。多商量,就是要提升协商的质量,在面对棘手的难题时不厌其烦地进行商量,通过平等探讨问题、坦率提出意见,不断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取得谅解,以求大同、存小异,达成最大共识。多商量,就是要扩大协商的范围,拓宽协商的渠道,充分利用政党、政府、人大、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各类智库等各种途径,合理运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尽量满足更多群众的愿望要求,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有事会商量”

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政治生活的装饰品,决不能用来做摆设。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自然也要实实在在地发挥作用,而不只是做做样子。不仅有事要好商量,而且有事要多商量,更为关键的是有事要会商量。不会商量,商量得再多也没有用。习近平指出:“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4]会商量,就是要坚持平等对话,要允许各有关单位和各利益团体,甚至是各相关个人,均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所涉议题的讨论,都能畅所欲言。会商量,就是要坚持理性论辩,面对分歧,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可以热烈讨论但不搞对抗,可以真诚交流但拒绝敷衍,可以尖锐批评但反对人身攻击。因为只有坦诚相待、互相尊重和理性对话,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会商量,就是要坚持精准协商,直奔主题而不散漫无边,直指问题而不兜圈跑偏,直抒胸臆而不拐弯抹角,要聚焦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要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儿往一处使,把真商量问题与商量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与解决真问题实实在在统一起来。

(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人民群众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对象。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很多决策和工作主要是在基层发生的,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显然应该放在基层,要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协商,也就是群众的事情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由大家来共同商量。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和部署,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人民的心声,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广泛协商。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四个“广泛商量”:即“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

由是观之,习近平有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系列论述中,集中阐发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就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基本主张,提出了一个饱含中国情怀、体现中国精神、富于中国风格、彰显中国智慧的中国民主政治观的新表达,形成了一个中心突出、逻辑一致、内涵丰富的“商量式”民主思想的基本构架。

三　“商量式”民主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的“商量式”民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与我国具体的民主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古今中外民主政治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开拓性创造,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优秀政治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商量式”民主思想是对我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团结奋进,融合凝聚,不仅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共同涵养出多姿多彩的优秀政治文化,例如:“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的政治哲学,“天下为公、共进大同”的政治理想,“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政治胸怀,“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方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政治诫条,等等。这些优秀的文化精神在政治实践中也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例如,在唐代的《贞观政要·政体》中就有这样的表述:“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这里表达的就是以商量为典型特征的政治制度安排。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出色的制度以及开明君王“从谏如流”的政治人格魅力,才造就了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包容、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显然,习近平的“商量式”民主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这些优秀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是把古代的“民本”思想升华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是把古代帝王“委百司商量”的有限民主和形式民主,实实在在地提升为党和政府事事时时“与众人商量”的全面协商、实质协商的广泛民主,真正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在了实处。

(二)“商量式”民主思想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它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坚持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牢固树立了“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建立了党同人民群众“血浓于水,鱼水情深”的深厚感情,取得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的“商量式”民主思想坚持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要求,作为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坚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要说要商量,好说好商量,能说能商量,会说会商量,真说真商量,使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社会更加和谐。“商量式”民主使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更加顺畅,不仅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而且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也有效地化解了许多一直存在却难以化解的纠纷,落实了许多在理论上可行而在实际生活中无法落地的政策。“商量式”民主充分保障了人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使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进一步增强,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商量式”民主思想,在新时代使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获得了重大发展,这不仅使党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而且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商量式”民主思想是对人民民主的丰富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自己的党纲,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发展了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倡议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协商组织“民主联合战线”,提出了民主建国的初步构想[9]。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原先的构想付诸实际,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创造出“三三制”原则,“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初步构建了包容性强、代表性广泛的抗日人民民主政权[10]。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充分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真正“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商量政府”,从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落实了民主建国的方案,使劳动人民终于翻身做了主人[11]。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协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平等协商、互相监督、共同参与、密切合作的专门协商机构,极大地活跃了我国的民主政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民主更趋成熟和稳定,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继写入宪法,我国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日臻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更加完善,而且人民民主的参与实践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四个“广泛商量”表明,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国家政治协商场域,即

以每年的全国“两会”为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国是,从根本上维护与巩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同时,人民民主也体现在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日常行政场域,即执政党、人大、政府等国家权力中枢与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共议民生,从各个层面保障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人民民主也体现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生活领域,即基层领导机构同基层广大群众通过基层协商、城乡社区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载体共商民情,并通过民主恳谈会、协商议事会、决策听证会、村(居)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等一系列协商民主实践,就群众关心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商量,从各个方面落实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

(四)“商量式”民主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概括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也就是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开展广泛协商。这既包括了传统的政治协商主体,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等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协商力量;也包括了新型的社会协商主体,也就是党和政府直接与之协商互动的社会大众、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民间协商力量。协商主体从政治力量扩展到广泛多层的社会力量,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包容性、广泛性与人民性[12]。“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也就是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当做同舟共济的“合作者”,而且也把老百姓当做鱼水情深的“好兄弟”。所有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小情都可以沟通,都可以商量,一切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都必须共同谋划,共同协商[13]。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协商客体进一步扩大了,由原来主要依托人民政协载体、由政党政治力量主体开展的“政治协商”议题,向通过基层协商、城乡社区协商、社会组织协商载体开展的“社会协商”事项延伸和覆盖,协商内容囊括了诸多领域、诸多层次、诸多范围,实现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12],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共享性、真实性和多样性。“有事会商量”,也就是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设计民主协商的制度安排,畅通沟通渠道,确立包括“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在内的正式协商渠道,“有组织、有重点、分层次积极稳妥推进各方面协商”,恪守理性原则,不断提升建言资政的质量,将协商民主的“广泛”与“多层”有机结合,进一步夯实了横向联动、纵向衔接的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实效性。

总的来看,习近平关于“商量式”民主的重要论述,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的全方位阐释,它不仅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有关谁来协商、协商什么、怎样协商等关键问题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具体说明,而且对于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充分论证。这就从根本上建构起了包括协商主体论、客体论和渠道论在内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体系,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因而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质内涵的科学概括。正如有的学者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商量’型民主,就是协商民主”[14]。“商量式”民主既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意涵的进一步丰富,又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遵循。

(五)“商量式”民主思想是对西方“争吵式”民主的反思和超越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世界上就长期存在着两种民主制度相互斗争和竞争的局面,一方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民主,另一方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当今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以议会选举、政党竞争、三权分立为核心内容,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少数民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则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基础,以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政党协商、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人民民主。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长期沉醉于“理性人假设”的民主选举的幻象中,民主实际上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角逐权力的政治游戏,由于排他性的利益冲突和“赢家通吃”的惯性驱动,政党之间恶斗不止,议员之间争吵闹剧不断上演,政府决策短视,行政效率低下,所谓的民主政府深陷困境而无法自拔。近年来,特朗普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一度停摆;英国两党恶斗,脱欧协议不断延期,历时五年;德法改革左支右绌,时局不稳。这些都集中暴露了西方“争吵式”民主的严重弊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总结了人类民主政治实践的新鲜经验,深刻了反思了西方选举民主至上的重大缺陷,认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

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因而必须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统一起来,既要通过依法选举人民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也要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保障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这种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就是习近平一再倡导的“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商量式”民主参与实践,它通过人民内部各个层面的广泛商量,将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有序纳入政治生活之中,直接参与意见表达和问题解决,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民主参与日渐踊跃,大家在平和、友善、诚恳的商量氛围中,讨论问题,发表看法,反映意见、提供线索,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到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商量式”民主本着寻求利益交集和最大公约数,商以求同,协以成事,有效克服了西方“争吵式”民主恶意质询、强硬逼问、一味批评、蛮横拒绝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协商的弊端,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实践中对立党派和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相互倾轧的弊端,有效克服了西方国家在决策之前闭目塞听、自以为是,在决策之后有相互扯皮、执行效率低下的弊端,有效克服了人民大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表达困难、参与无门的缺陷和投票率屡走屡低的困境,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中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质严重分裂的弊端和不足。总之,“商量式”民主彰显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和勃勃生机,是习近平在“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的新时代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2(2).

[2]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 人民日报,2016-01-31(1).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2017-10-28(1).

[4] 习近平. 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03-05(1).

[5] 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N]. 人民日报,2019-04-24(1).

[6]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9-09-21(2).

[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1).

[8]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15-02-10(1).

[9]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5-46.

[10]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75.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8.

[12] 和思鹏. 习近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及其时代价值论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17(12):11-17.

[13] 黄 霞. 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对习近平总书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重要观点的解读[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9(3):24-28.

[14] 李君如.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谱写人民政协事业新篇章[N]. 人民政协报,2014-10-15(4).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NIU Jun-wei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 Jinping has thought deeply on how to make the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more extensive, multilevel and institutionalized,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t inherits and carries forward the f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our country, upholds and develops mass line of the CPC, and scientifically answers a series of important questions such as on what is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how to build i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us, it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reveal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but also provides the basic political principles for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it in the new era. It not only enriches and innovates people's democracy in China, but also reflects on and surpasses the bickering democracy in the west, which is a new contribution to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bickering democracy